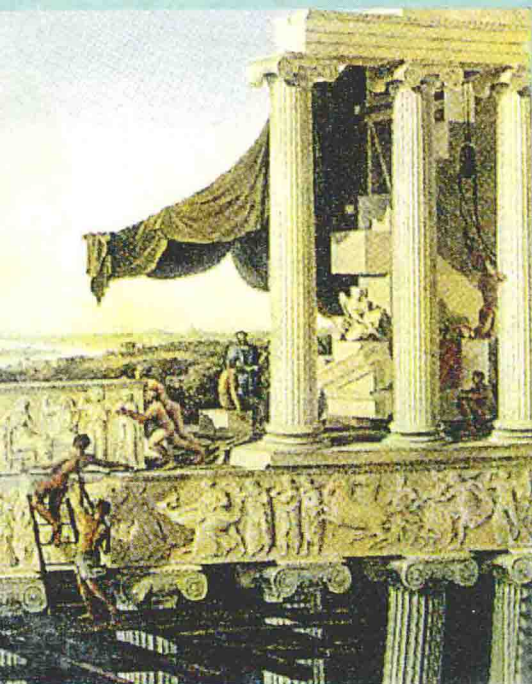


乌托邦

〔英〕托马斯·莫尔



理想国

〔古希腊〕柏拉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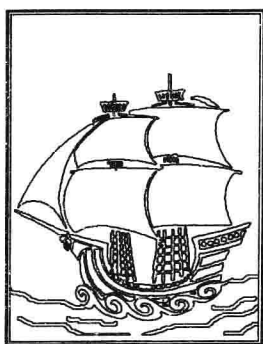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世界名著百部·第99部

乌托邦

[英] 托马斯·莫尔 著
戴镛龄 译



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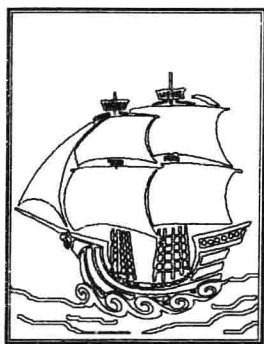
录

“乌托邦”的历史意义	(5)
托马斯·莫尔向彼得·查尔斯问	
好的信	(20)
“乌托邦”第一部	(25)
“乌托邦”第二部	(59)
关于城市，特别是关于亚马罗提	
城	(62)
关于行政长官	(64)
关于职业	(65)
关于交际生活	(70)
关于乌托邦人的旅行	(75)
关于奴隶	(94)
关于战争	(103)
关于乌托邦人的宗教	(112)
附录一	(129)
莫尔和伊拉斯莫斯的书信摘录	
.....	(129)
附录二	(142)
莫尔小传	(142)
“乌托邦”的版本和翻译	(148)
注释	(155)
参考书目	(186)

世界名著百部·第99部

乌托邦

[英] 托马斯·莫尔 著
戴镛龄 译



《乌托邦》全书名《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空书》，是一部对话体的长篇幻想小说。全书以作者同航海家拉斐尔和希斯拉德两人的对话形式写成，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记录了拉斐尔访问英国时的所见所闻，讲到英国政府建立牧羊场的“圈地运动”，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是“羊吃人”的社会。作者主张废除私有制，从而开创了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光辉篇章，开近代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先河。第二部分，作者幻想出一个理想的社会：岛国的元老由民主选举产生；这里实行公有制，统一管理、按需分配；男女平等，共同从事劳动，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作者以全新的价值观设想了一个全新的社会，马克思曾从中得到过启迪；恩格斯盛赞它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微光”。

作者托马斯·莫尔，英国政治家、作家，文艺复兴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莫尔的主要作品是用拉丁文写的《乌托邦》，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

目

录

“乌托邦”的历史意义	(5)
托马斯·莫尔向彼得·查尔斯问	
好的信	(20)
“乌托邦”第一部	(25)
“乌托邦”第二部	(59)
关于城市，特别是关于亚马罗提	
城	(62)
关于行政长官	(64)
关于职业	(65)
关于交际生活	(70)
关于乌托邦人的旅行	(75)
关于奴隶	(94)
关于战争	(103)
关于乌托邦人的宗教	(112)
附录一	(129)
莫尔和伊拉斯莫斯的书信摘录	
.....	(129)
附录二	(142)
莫尔小传	(142)
“乌托邦”的版本和翻译	(148)
注释	(155)
参考书目	(186)

“乌托邦”的历史意义

沃尔金院士

人道主义者和伦敦商界的宠儿、英吉利国王的大法官和那部鼓吹建立在财产公有原则上的社会制度的卓越对话的作者托马斯·莫尔，是复杂的十六世纪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那个时代的一切矛盾，在形成特殊的绝无仅有的统一之后，仿佛都集中在他身上。那是资本主义发生的时代，资本主义通过封建关系狂暴地发展起来，而且其本身已经带有着它所特具的新的社会对抗的开端。

莫尔的“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De optimo reipublicae statu”）的小册子，以简称“乌托邦”而异常著名，像它这样影响长久的作品，在政治和社会文献中是少见的。这个名词对于一定的文学形式（乌托邦的小说）已成为通用的了，这不是偶然的。所谓空想社会主义这一社会思想的整个方向，是和他以及他的基本论点分不开的，这也不是偶然的。可能，莫尔本人在总结

自己的生活经历时，认为“乌托邦”的意义比不上他的大法官的职位，比不上他为抵抗宗教改革所作的斗争。我们在莫尔被惨痛处死四百年后（他是一五三五年被处死的）重读“乌托邦”，比他的同时代的人还感到更大的兴趣。而我们之所以对他的活动的其他方面发生兴趣，首先因为他是这部卓越的对话的作者。

“乌托邦”是最初对空想社会主义的特征的许多原理加以明白阐述的一本书。这正是这本书不曾减少的吸引力的根源。我们可以假定地说到古代世界的社会主义的要素，由这些要素可体会到消费共产主义、人类社会初期福利共有的观念、公共生产组织的含糊的思想等。可是，这一切都是暗示和零星的意见，没有连贯成整个的系统。当我们探讨“乌托邦”的可能有的文献张本时，我们应该考虑到这些意见的存在。人道主义者莫尔很熟悉曾在自己的作品里反映过这些意见的柏拉图和其他希腊作者。在“乌托邦”里，莫尔提到早期基督公社的神话式的“共产主义”。无疑的，莫尔利用了这些主题，建成一个新的、全面周密考虑过的整体，而这个整体是古代奴隶制文化所无能为力的。作为那些意见的成熟的体系的空想社会主义，只有在新的时代，在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所创造出的基础上，才会发生。首先阐明这体系的功绩当然属于莫尔。

“乌托邦”的文学形式（关于在一个无人知晓的国家游览的故事）和古希腊后期的游记体小说是近似的。这种形式直到十九世纪还保持着它的活力（如卡贝的“伊加利亚旅行记”）。但是，这种形式，在历史上任何其他时期都不如在莫尔的时代更能迎合大家的口味。“乌托邦”是在十五世纪至十六世纪地理发现已经开始而远未完成的情况下写成的。勿庸怀疑，比“乌托邦”稍早

出版的书，如一五〇七年的“宇宙志引论”（“Cosmographiae Introductio”）及一五一一年的“新世界”（“De orbi nova”），是莫尔所知道的。以叙述新发现的国家为内容的书籍，不但在“乌托邦”的形式上能给予莫尔以暗示，在这些书里，他还可以找到用以发挥“乌托邦”的基本论题的材料：关于美洲及西印度土人的生活故事，这些土人“不知你的和我的之间的分别”，他们共同使用作为公共财产的土地，鄙视黄金及珠宝……“乌托邦”和这种文献的关系似乎可以用这样一事实来说明，即莫尔把亚美利哥·韦斯浦契的旅伴之一作为他的对话的中心人物。

对十六世纪初期条件下莫尔的社会政治思想所能达到的水平说来，“乌托邦”形式是再适合没有了。“共产党宣言”说到十九世纪初的伟大的乌托邦主义者。“这种玄想的未来社会方案是在无产阶级还处于很不发展状态……是从无产阶级希望社会普遍改造的那种模糊趋向初次激发中产生出来的。”对于莫尔的时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产生玄想的未来社会方案的条件所作的这个指示，其具有效力当然不亚于对圣西门和傅立叶的时代。被莫尔看出而且引起他严厉指责的社会矛盾，只有一种萌芽着的力量才能加以消减。莫尔虽有天才，却未能在他的周围的社会里觉察出这种萌芽着的力量。社会的发展还不曾创造出把无产者形成一个阶级的那种必要的先决条件。科学社会主义尚不曾到成熟的时候。“玄想的方案”在莫尔时代的条件下，是用以表达他的勇敢的社会思想的唯一可能的手段。

“乌托邦”第一部的基本内容，是关于莫尔那个时代在欧洲各国中盛行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的谈话。

在表示出作者观点的游历家希斯拉德的谈话当中，当时在英



国达到极点的绝对君主制度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希斯拉德抨击君主制度的对外侵略政策，这种政策不但使被迫作战的国家受到蹂躏，而且使本国的生灵涂炭。他指出，君主为了贪财图利，对臣民进行无情的剥削，悍然不顾那昭示执政者必须照顾臣下幸福、保护臣下利益的这一合理统治的原则。希斯拉德断言，人民选举执政者乃是为了人民自己，不是为了执政者本身；君主的光荣和安全在于人民的幸福。可是，这些正当的道理在国王的宫廷上是被置若罔闻的。国王的谋臣们阿谀奉承，经常为那些专以剥削老百姓为目的的决议案去寻找辩护的某些论据，将各色各样加强剥削的方法用心向国王暗示……为此种种，他们臆造出了这样一种“理论”，即认为国王不会做不法的事，因为国家的一切，乃至国民，都是属于国王的；老百姓所有的财产，只限于出于“国王的恩赐”而不向他们索取的那部分。他们还就这种理论大发谬论，说国民贫穷似乎会养成他们的忍耐的习惯，而且能保障社会安宁。相反地，贫穷倒往往是产生不安宁的根源：那些不满意现存的生活制度的人尤其憧憬于革命。一个国王，既然在统治中剥夺了国民的生活福利，就应该承认自己执政无能。但是，国王们所更加关心的，是怎样用合法的以及不合法的手段去获得新的王国，而不是怎样去好好治理已获得的王国。为了战争，每个国家都拥有大批游手好闲的人，这种人是不宜于和平的劳动、也轻视从事劳动的人。希斯拉德在回答和他对话的英国人时说道：“为了预防战事于万一（其实你不要战事，战事是决不会发生的），养活难以计数的这批人，在我看来是对国家丝毫没有好处的。这样的人危害着和平。不管怎样，和平是比战争更应该多多被我们关心的东西。”莫尔也借希斯拉德的话，相当坚决而率直地揭露



了各国社会关系中异常令人惊心动魄的“溃疡”，莫尔指出“数目庞大的贵族”是首要的祸根，最足以说明当时的社会的特征。贵族就像公蜂，终日无所事事，强迫自己地产上的佃夫为他们劳动。贵族为了增加收入，“敲骨吸髓”似地刮削朴实的老百姓，老百姓须辛苦操作去养活贵族和贵族的大批奴仆。莫尔在这样指出当十六世纪初期未被英国根绝的封建制度的基本矛盾后，接着特别强调那些可恨的新的标志，这些标志把已经开始了的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带进封建关系的一般特征中。“乌托邦”第一部包含有几乎在一切论十六世纪英国的书中都引证过的那种特征，即在养羊业发达的影响下，英国农民的土地遭到剥夺——这是资本主义关系发展中重要的因素之一。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论及原始积累的过程，两次引用了“乌托邦”。

希斯拉德说：“你们的绵羊本来是那么驯服，吃一点点就满足，现在据说变得很贪婪很凶蛮，甚至要把人吃掉，把你们的田地、家园、城市要蹂躏完啦。”这种饰着戏谑外衣的谴责，对于就农民丧失土地的原因及后果所作的深刻尖锐而且充满着炽热怒火的分析，是一个序曲。莫尔和希斯拉德认为，羊毛的需要以及羊毛价格的上升是这种过程的开始关头。这个上升使大量土地占有者可能通过从农业转到养羊业的方法来扩大他们通常来自地产上的收入。拥有出产上品羊毛的地区的僧俗业主们很快就考虑到他们可能这样做，并且开始把自己全部土地划出做牧场，把从事耕作的佃农驱逐出去，让有人烟的住区变成了旷野。他们用诡计或暴力，迫使凡稍有产业的农民贱价出卖自己的产业，离开自己惯住的地方：养羊业决不如耕种业需要那么多的人手。这些可怜的人们，不知何处安身是好，在漂泊中很快就把变产所得的一切



花得干干净净。任何人都不需要他们工作，他们因此势必以讨饭为生，或是沦为盗窃。农民破产了，而同时那些一向从事羊毛加工和织布的穷人也破产了，和羊毛有关的全部事务落到少数富人手里。这些富人任意操纵市场，除自己本身的利益外，谁的利益也不考虑。因此，由于少数人的贪得无厌，会使对国家有利的东西变成对国家有害的。

希斯拉德说，政府理应制止富人的专横，迫使他们把农庄田园恢复起来，让穷人可能恢复农业和羊毛加工工作。可是，政府不是采取任何行动来消减祸害的根源，却用尽法律的压力来打击那些无从作正当的劳动而不得不流浪盗窃的穷人。希斯拉德一面指出政府所应遵循的道路，但同时并不相信任何明智的忠告会使政府依照这条路走。他在另一处提到，国家“似乎只是一伙富有者狼狈为奸，表面名义上代表国家，实则为私人利益打算”。明智的忠告不能克服国王的政治见解。这些见解在国王左右的人们中占有优势，并且和他们自己的口味和愿望是适合的。国王和他的谋臣固守着根深蒂固的传统，对于一切新事物总是表示抗拒。他们从小就感染上错误的见解，不可能对于哲学家讲的道理正当地予以估价。当他的对话者建议他去事奉一个国王，他的回答是：“假使我在任何国王的宫廷上，对于富国利民的措施作出条陈，尽力从国王身上根绝那些祸害因素，那么，我不是马上就遭到放逐，不是成为笑柄么？”由此可见，希斯拉德虽然否认从上面的改良是可能的，可是却没有提出革命的改革来和改良对抗。然而必须指出，他议论中有一个地方，仿佛在顺便当中，把“受压迫者的起义的精神”说成是“高尚的”精神。

莫尔并不仅仅分析社会制度的个别缺点以及探寻出同这些制



度进行斗争的特殊方法。他从分析个别的祸害提高到他认为是一切祸根的总原因。这个总原因即是私有制的统治。本书的第一部议论到私有制的最后几页，不但在文学上，而且在逻辑上也是全部“乌托邦”的中心点。在这几页里，作者作出了从上面对英国社会制度的批评所得的总的结论，也对下面要描写的理想社会制度提供了理由。

希斯拉德断言，在私有制度下，既不可能谈到正义，也不可能谈到社会安宁。在私有制度下，每个人尽可能把一切据为己有。不管社会上财富多么充足，这种财富是落在少数人手里；其余的人们的命运就只有贫困。前一种人通常是凶狠邪恶的；后一种人是朴直真诚的，经常从事不是有利于自己个人而是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劳动。要建立公正的秩序，必须彻底废除私有制，莫尔认为，一切局部性的改革，都是治标的办法，不能治好社会的疾病。

正和欧洲各国的制度相反，乌托邦的制度是没有私有制的制度。这样的对照，就其本身来说，在社会政治文献中并非新的。如同我们已经提到过的，这种对照是许多古代思想家所固有的。可是，莫尔在“乌托邦”中抱定的任务，是具体地指出怎样便可以在平等的基础上不要私有制度，而把公共生产组织起来。这个任务被莫尔完全独创地提出而且予以解决。就这点说，他没有师承，没有先驱。

乌托邦社会代表某种经济统一性。作为国家最高机关的元老院，估量各个区域的全部产品，并且得于必要时重新分配产品。乌托邦的全部土地都是公有财产。国家可将劳动力从甲地调配到乙地。对外贸易也由国家经营。可是，生产的直接组织者不是整



个国家，而是城镇。对于莫尔，国家仿佛是城镇的联盟。

在乌托邦，家庭是基本经济核心，每个家庭从事于一定的手工业。家庭作业是在国家官员的监督之下；凡家庭自己所生产的产品都交与国家。这样，家庭实际上乃是公共的作坊。对这点还应该补充一下，即这种家庭未必以血统关系为基础的自然家庭。也许甚至可以认为，不是血统关系，而是经济统一性，才是家庭的基本标志。不愿操家中的手工艺的儿童，可按照自己选择的职业过继到别的家庭中去。因而，亲属可存在于各种不同的家庭中；每个家庭只从事一种手工业。当一个家庭的规模超过经济上的需要时，国家就把它成员调配到另一家庭中去。

不难理解，这种家庭手工业的生产组织在乌托邦是如何发生的。在商业资本影响到莫尔时代已经大大地蜕化的中世纪手工业，无疑地是这种生产组织的真正原形。我们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莫尔是把这种手工业制度的后来的一段发展去掉，把它恢复到原来的状态。但是，对于莫尔，资本的腐朽影响不是单纯地被消减掉，而是由国家领导的有益的影响来代替。不言而喻，这时结果就不是正确的根据历史的恢复，而是按照作者一般意向加以理想化的恢复。但我们毕竟还是得通过这些理想化的特点才可以看懂原书。

家庭手工业体系普及整个乌托邦社会，只有极小的例外情形。公民和家庭有联系，也和手工业有联系。每个公民学一种手工业。手工业几乎是他一生劳动过程的基本职业。在乌托邦，农业不是一种手工艺，这点足以说明莫尔的特色。这是乌托邦制度的一种最有趣味的独特之处。在乌托邦，耕作被认为有重大的意义。可是，农业劳动是按照劳动义务制的原则组织起来的。每个



人必须从事两年的农业劳动。只有特别爱好乡村生活的人，有时可以请求把这个两年的期限加以延长。因此，就乡村的真正意义来说，对于乌托邦是生疏的。乡村里只有农场，人们从城镇到那里操作一个时期，期满又回到城镇重操自己的主要的手工业。一切公民的基本住宅区和一切工作的组织中心是城镇，城镇附有公民可用以耕种的一定地区。这样，在新时代的第一部具有社会主义意义的著作中，就已计划了城市和乡村对立的消减，虽然在方法上是很原始的。

手工业和农业的一切产品构成了全社会的财产。每个公民从公共仓库或公共市场领得他所需要的东西。在后来的各种乌托邦中，我们发现形形色色的在公民中分配产品的形式：有的规定算术上均等的定额，有的采用按劳取酬的原则，还有的是按照需要进行分配。莫尔在乌托邦里实行最后的一种形式，也是最彻底的一种形式。每个家长需要多少产品，就从社会上领取多少，在这方面他从不会遭到拒绝。莫尔已经明白，这样“按照需要”分配，是以产品充足为先决条件。有了充足的产品，就“用不着害怕任何人取得过多”。可是，他相信，这样的充足在乌托邦里是有保证获得的。

我们关于社会过渡到更高的共产主义阶段的观念是和生产力的增长相联系的。只有“在生产力跟着人们一切方面的发展也增强起来，并且在合作的财富源泉更丰富地涌流出来之后——然后能够完全超过那些狭隘的资产者的权利的眼界，这个社会在它的旗帜上写着：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生产力迅速增长的可能性的思想对莫尔来说是陌生的。在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之交，即是当莫尔活着的时候，技术进步在经济生活中的意义表现得还很薄



弱。我们在“乌托邦”一书里没有发现提及乌托邦社会在技术基础上有任何鲜明的优越之处。但是莫尔深信，在限定六小时工作日的情形下，可以保证全体公民得到充足的物资。

莫尔证明，把乌托邦里的寄生现象完全取消，就可以在同样的技术方式下有充足的物资。莫尔在描写社会寄生现象的特性及其意义时，是傅立叶的直接先驱者。在傅立叶的学说里，如大家知道的，寄生现象问题占有重要的地位。毫无疑问，傅立叶在这个问题上依照十九世纪的情况，发展了“乌托邦”的基本原理。莫尔把豪门贵族、教士、侍仆、乞丐都看做寄生者。他把从事生产奢侈品的人们，以及劳动力使用得完全不合理或根本不使用劳动力的妇女，也都归于寄生者一类。

在乌托邦，只有从事于社会所不可少的活动的人们，而且只有当他们实际担任着被认为对公众有益的职责，才可以免除体力劳动。譬如，国家的官员免除体力劳动；被认为有才能而适宜于做科学工作的青年也免除体力劳动。假如，经过一定的时期，这样的青年辜负了寄托在他们身上的希望，他们就得转向体力劳动。反之，假如在履行着体力劳动的公民中有任何人表现出能从事智力活动，他就无须再从事体力劳动，而被调到智力工作者当中去。

由于技术进步的观念极端缺乏，所谓“不愉快的”劳动问题就难以解决了。几乎对于一切乌托邦主义者，直到十九世纪，这问题都是一块绊脚石。要解决这问题，有两条可能的途径。一条途径是，获得一批恰是对于担任这类工作感到特殊兴奋的公民。例如，就傅立叶说，他是把具有这种兴奋倾向的儿童组织起来去做成年人所厌恶的工作。另一条途径是，组织任何一种强迫劳动

